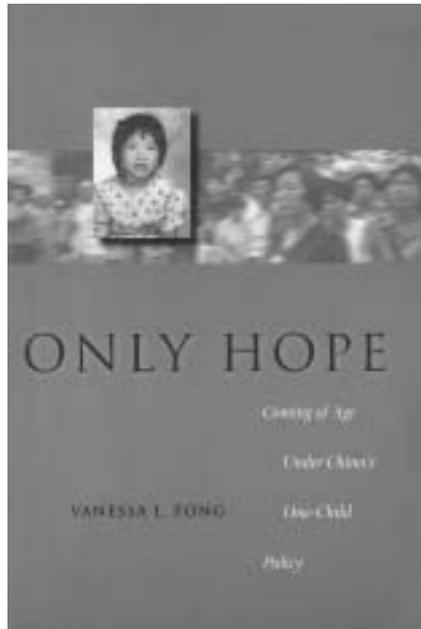


不能承受的希望之重

——讀《唯一的希望：中國獨生子女政策下的新時代》

● 王曉燾

似乎很多人都忘記了計劃生育政策中更為雄心的後半句：「提高人口素質」。因此，馮文在這裏找到了她的問題：「提高人口素質」這一目標在何種程度上達成了？獨生子女（以及他們的家庭）在這種「素質」提高中扮演着怎樣的角色？



Vanessa L. Fong, *Only Hope: Coming of Age under China's One-Child Polic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筆者在很偶然的情況下讀到了馮文 (Vanessa L. Fong) 博士的〈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與都市獨生女的賦權〉(“China's One-Child Polic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Urban Daughters”)

一文^①。該文給筆者留下的印象有兩方面：一方面，它帶來了中國學者所沒有的新鮮視角；另一方面，卻予人有「水土不服」之感，總覺得其研究多多少少還是脫離中國情境——即使是一個扎實的人類學研究。在追溯這篇文章的研究脈絡時，筆者注意到，該文是馮文《唯一的希望：中國獨生子女政策下的新時代》(*Only Hope: Coming of Age under China's One-Child Policy*，引用只註頁碼)一書的一個章節。

正如這本書的標題所提示的，馮文力圖展現並討論在一個幾乎全部由獨生子女家庭組成的社會中^②，獨生子女究竟經歷着怎樣的生命故事。在書中，馮文的理論展現比上述文章更為徹底，理論思路更為明晰，故事的呈現也更為詳盡。然而，在筆者看來，上述兩方面的印象卻仍然存在——既受益於其獨特視角的啟發性，又總覺得馮文在某些地方並沒有完全說明白，讓人有繼續往下說甚至重新開始說的衝動。這種衝動成為寫作這篇書評的一個動因。

獨生子女政策在中國不是一個新課題。早在1980年代，該政策開始執行初期，就有大眾媒體和研究者預言，獨生子女必將是「垮掉的一代」，父母過份溺愛所塑造的只會是中國「小皇帝／小公主」。到了2008年，汶川地震中媒體幾乎集體轉向肯定「80後」「有擔當地撐起中國的脊梁」^③。晚近也有愈來愈多嚴格基於大規模社會調查的研究表明，中國獨生子女與非獨生子女之間並不存在顯著的不同，獨生子女身份並不是形成心理、社會和道德問題的原因^④。但所有這些話語都因為中國獨生子女的政策性而集中於獨生子女（相對於非獨生子女）是否形成了特異性^⑤。換句話說，這些研究的焦點集中於計劃生育政策在「控制人口數量」的同時是否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後果。

當這項國策的合法性被置於「實現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時，似乎很多人都忘記了國策更為雄心的後半句：「提高人口素質」^⑥。因此，馮文在這裏找到了她的問題：「提高人口素質」這一目標在何種程度上達成了？獨生子女（以及他們的家庭）在這種「素質」提高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獨生子女是否已經有足夠的「素質」來引領他們的家庭以及國家走向現代化？顯然，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

作為一個訓練有素的人類學學者，馮文在1997至2002年間在大連市進行了為期二十七個月的田野調查^⑦。作為一個方法上的實用主義者，馮文在搜集第一手觀察和訪談資料之外，同時進行了一個社會調

查。她利用自己的英語優勢，以義務英語教師的身份在大連的一所職業高中、一所初中，以及一所非重點高中供職，以此接觸和觀察學校中的學生。她的社會調查也是於1999年在這三所學校供職時完成的。職高一年級和二年級大部分班級的學生、初中二年級和三年級的所有學生，以及非重點高中的所有學生構成了調查的樣本。最終93%的註冊學生，共2,273人完成了調查。他們當中94%是獨生子女，5%有一個兄弟姐妹（頁5）。藉由英語教師的特殊身份，馮文也通過義務英語家教進入部分學生的家庭，這構成了馮文田野資料的主要來源。在107個邀請她到訪的中國家庭中，馮文與其中的31個家庭建立了具有情感基礎的長期互動，並且後來仍然與他們保持電話／電子郵件的聯繫（頁8），這些家庭為馮文的研究提供了異常生動而細緻的故事。

馮文通過這些資料為我們講述了中國獨生子女怎樣的故事？出人意料的是，該書一開篇就指出，「最重要的不是獨生子女身份本身，而是在一個曾經滿是大家庭的社會中成為了獨生子女。」（頁2）因此，馮文將視角聚焦於家庭生育水平的快速下降，並將其視為中國現代化過程的重要後果。

在理論上，馮文從人類學概念「文化模式」出發，提出「現代化的文化模式」（cultural model of modernization）（頁13）。在馮文看來，中國的獨生子女（家庭）都是被「現代化的文化模式」所激勵的。借用沃勒斯坦（Immanuel M. Wallerstein）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對核心、半邊

在馮文頻繁接觸的教育領域，所有的父母都不惜代價地為自己的孩子進行最好的「投資」，獨生子女被作為「唯一的希望」承載著家庭和國家實現現代化的重任。但是，馮文為獨生子女設定了一個相對灰暗的前景——投資與期望已經在家庭和代際之間產生了緊張。

藉由「現代化的文化模式」這樣一個概念，獨生子女不得不成為自己家庭的唯一的希望，也是中國唯一的希望。以低生育率為目標卻直指中國現代化的計劃生育政策，注定了獨生子女要背負着中國「素質」的重任艱難前行。

陞和邊陞的劃分，馮文認為中國處於從邊陞邁向核心，或者用中國人更容易接受的說法，是從「第三世界」向「第一世界」邁進的現代化過程之中（頁14）。現代化過程在中國社會不斷創造着期待、話語或者目標，來激勵社會中的獨生子女及其家庭不斷為之行動。

馮文認為，她所訪問的大連獨生子女家庭都已經將這種現代化的野心接受為理所當然，他們因此為自己的家庭設定了相應的目標，而把所有希望都寄託在家裏唯一的孩子身上。於是，在馮文頻繁接觸的教育領域，所有的父母都不惜代價地為自己的孩子進行最好的「投資」，獨生子女被作為「唯一的希望」承載着家庭和國家實現現代化的重任。

另一方面，馮文卻借用魯迅「希望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名言（頁178），為獨生子女設定了一個相對灰暗的前景——投資與期望已經在家庭和代際之間產生了緊張：社會向上流動的限制（尤其是中國城市社會的分層結構和正在變動的就業結構），使得「現代化的文化模式」所設定的道路，不僅過程充滿着艱難，而且結果還將是太過狹窄而容納不了所有人。

因此，馮文點出了她眼中的中國獨生子女的關鍵特點：斷裂——在家庭和國家現代化的高期望與現實的家庭壓力及市場競爭之間的斷裂。在馮文所不斷呈現的獨生子女（家庭）的各種故事中，獨生子女成為「精英」的期望和實踐，在現實的各種情境中遭遇順從、壓力、逃避甚至反抗。計劃生育政策下的一代

獨生子女在某些方面來看顯然是幸運的。在整個家庭中，他們不需要像其上一代那樣與自己的兄弟姐妹分享家庭的資源；父母也毫不猶豫地將家裏所有可以利用的資源都投資在他們身上。他們已經享受到了「第一世界」孩子的生活模式和消費水平（頁154）。但是與那些「第一世界」的孩子不同的是，獨生子女面臨着更高的期望和更重的壓力，走向「精英」的教育和工作之路充滿了激烈的競爭；而獨生子女政策所帶來的諸如老齡化和家庭結構轉變的影響，為獨生子女帶來了獨力照顧家庭和養老的沉重負擔。

「接下來的一個月將決定你的未來。」（頁31）這句話恐怕會讓每一個「80後」的獨生子女心有戚戚焉。高考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根據馮文的邏輯，這正是最值得關注的家庭（父母）對獨生子女的投資得到回報的關鍵時刻。高考形成了一個重要的機制，它提供向上流動的機會（當然這種機會還需要經受大學畢業後競爭激烈的勞動力市場的考驗），但是這種機會是有限的。因此，馮文看到的是生活標準異常高的獨生子女滿載着沉重的希望和厚重的負擔，集體投入到這場異常激烈的競爭中來。而在高考之後，僅僅只有一部分獨生子女成功。那種希望、競爭、緊張、負擔並沒因此而平息，而是一直在不斷湧動。這股難以平息的暗流將帶來獨生子女前路的曲折。

因此，藉由「現代化的文化模式」這樣一個概念，馮文告訴我們，故事不是由獨生子女開始的，卻必須由獨生子女及其家庭承擔相

應的成本。獨生子女不得不成為自己家庭的唯一的希望；獨生子女也是中國唯一的希望。他們是中國衝向現代化的產物；以低生育率為目標卻直指中國現代化的計劃生育政策，在這些獨生子女出生之前，就已經注定了他們要背負着中國「素質」的重任艱難前行。

當然，任何政策都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後果，計劃生育也不例外。馮文敏銳地看到了計劃生育政策下城市家庭中的獨生女在客觀上獲得了與男孩相似的投資，所謂「女兒兒子都一樣」（頁130）。當整個家庭中只有一個孩子作為「唯一的希望」時，中國傳統的「重男輕女」話語失去了重要性。「小皇帝」和「小公主」都將得到父母全部的投資，同時還背負着父母和家庭全部的期望和壓力。

在整本書中，馮文通過對獨生子女「素質」和「教育」的切入來試圖拓寬已有的關於獨生子女的研究範式——在其整個研究中，甚至沒有出現作為「天然的參照群體」^⑥的同齡非獨生子女。馮文的研究路徑是切入到獨生子女的真實的家庭生活中去，以一些重要的「過渡」階段（如高考）講述獨生子女背負沉重希望前行的故事。這些故事的背景，則被置入到她所謂的「現代化的文化模式」中。獨生子女是中國雄心勃勃走向現代化的一項產物；馮文重點告訴我們的是，這些獨生子女及其家庭將在中國的現代化道路上繼續付出相當的代價。

即使從上述經過筆者剪裁的論述中，還是可以看到馮文的分析所帶來的啟發性。她使用了一個簡潔明晰的理論，就將與中國獨生子女

聯繫在一起的種種問題，如家庭溺愛、教育重負、養老壓力等等，都整合在了一起。與中國學界常見的研究模式不同的是，馮文跳出獨生子女群體本身，也跳出了獨生子女／非獨生子女的異同，將其視野置於更為廣闊，在她看來也更為結構化和內生化的所謂「文化模式」；獨生子女及其家庭被置於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之中。而在這種分析模式之下，獨生子女不再是問題的關鍵，馮文看到的問題的重心在於計劃生育政策推動下異常急劇而又野心勃勃的社會轉型過程。根據這樣的邏輯，超前的目標與現實之間的斷裂為獨生子女的整個生活狀態埋下了種子。

這裏不妨以在中國媒介和學界反覆提及的獨生子女「溺愛」問題為例。在馮文的視角下，這一問題成為了目標與現實斷裂的一種表徵。馮文並沒有去講述獨生子女被「溺愛」的故事，而是出人意料地為獨生子女設定了特殊的參照群體：「第一世界」的孩子。中國獨生子女的種種行為、態度、表現如果跟「第一世界」的孩子進行比較的話，根本不存在任何的「不尋常」，無論在生活、飲食、家務、交往還是適應方面。所謂的「溺愛」也許只是家庭和國家「並不現實」地給了中國獨生子女類似於「第一世界」孩子的高期望，這些期望在「第一世界」終將是易於實現的，但是在中國，卻只能成就「被寵壞的精英」（頁171）。

但是另一方面，馮文的視角，包括作為其核心的「文化模式」或者「現代化的文化模式」，卻總是讓筆者覺得「水土不服」。這些概念／視

在「現代化的文化模式」這種分析模式之下，獨生子女不再是問題的關鍵，問題的重心在於計劃生育政策推動下異常急劇而又野心勃勃的社會轉型過程。超前的目標與現實之間的斷裂為獨生子女的整個生活狀態埋下了種子。

獨生子女所涉及的故事絕不僅僅是一個從不發達到發達的轉型過程，而應該是一個包容了傳統與現代、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歷史與現在、東方與西方、延續與變遷等異常複雜同時也是異常生動的轉變過程。

角帶來的新鮮感受可能與它們所掩蓋的東西一樣多（如果不是更多的話）。馮文將所有的理論建構都簡單化到「現代化的文化模式」，顯然是對「現代化」本身過於輕信了，尤其是太過沉浸於現代化與低生育率兩者的關係之中。

馮文在很大程度上似乎顛倒了現代化與低生育率之間的因果關係。以她所謂「第一世界」的已有經驗來看，現代化過程帶來了生育率的降低。但是在她對中國獨生子女政策的論述中，卻認為中國政府不惜以強制性手段降低生育率是為了達至現代化的目標。確實，在中國推行計劃生育的過程中，發生了很多的事情。但是，無論怎麼看，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都是在總體上提高中國人的生活水平和對活着的中國人負責的意義上獲得合法性的^⑨。這項如今已經受到世界肯定的社會政策，是在沒有其他更好建議的情況下的一種最優選擇^⑩。儘管馮文的研究有助於我們考察「提高人口素質」究竟在何種程度上達標，但是將計劃生育政策完全與「素質」和現代化聯繫在一起，也許並不恰當。根據馮文的邏輯，很難解釋在本世紀初中國計劃生育政策有了一定程度的放開和調整。

在馮文的視野中，中國社會所瀰漫的「現代化的文化模式」使得這個社會都被由「第三世界」向「第一世界」發展的圖景所籠罩。這種現代化發展圖式出現在包括計劃生育政策在內的一系列國家政策中，而馮文所看到的大連市獨生子女及其家庭也全然接受這種線性的發展圖式，並且以這種圖式下的目標激勵自己和家庭的大量行為。馮文的這

樣一種視野只能是源於其對「現代化」的簡單理解以及對「現代化」力量一廂情願的相信。馮文的研究邏輯中存在着重要的斷裂：她所看到的這樣一種現代化野心是怎樣被大連市所有的獨生子女及其家庭接受的呢？

作為一個外來的觀察者，馮文的看法局限於其所受的西方學術訓練與專業，她看到了中國社會中的獨生子女現象，但是卻並沒有為她的故事講述提供非常恰當的理論基礎。無論怎麼看，「現代化的文化模式」理論都太過無視在中國社會中已經存在並作用多年的傳統。以馮文的文化模式而言，中國的獨生子女社會就僅僅受到現代化這一種單一文化模式的衝擊，而不受其他任何文化模式的影響，但筆者以為，任何一個從中國社會裏面出來的觀察者，都會看到很多馮文視而不見的傳統，諸如性別、傳承、家庭、倫理等等。

因此在閱讀中我們常常感到，馮文細緻的田野調查和深入的訪談所提供的故事信息要遠遠比她的理論框架來得多。獨生子女所涉及的故事絕不僅僅是一個從不發達到發達的轉型過程，而應該是一個包容了傳統與現代、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歷史與現在、東方與西方、延續與變遷等異常複雜同時也是異常生動的轉變過程。以下不妨以傳統為視角，重新來講述馮文所謂的都市獨生女受到賦權的過程。

馮文看到了大連的獨生子女家庭中，女孩和男孩一樣都得到了父母大量的投資。在她的解釋框架下，是「現代化的文化模式」改變了母親的社會地位，改變了婚姻模式

和勞動力市場，改變了家庭角色分工，因而獨生女在沒有兄弟姐妹的競爭下享受了原來只由男孩享受的家庭投資。這樣的分析儘管看似詳盡而有理，但是卻極大地忽視了傳統因素。她在前述的文章中提到木蘭從軍的例子^①，但應該看到，獨生女受到賦權與木蘭從軍的理由幾乎是一樣的，「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缺乏(合適的)男性。這樣一種傳統的延續性卻在馮文的整個解釋中未曾體現。如果倚重傳統進行解釋，則獨生女的賦權源於家庭中男性子嗣的缺乏，中國傳統的重男輕女觀念仍然有着重要的影響，都市獨生女的賦權只是一種替代。儘管我們無法預知未來的走向，畢竟傳統在中國也處於一種變遷和轉型中，但至少在筆者看來，傳統的解釋依舊是重要的，否則就沒有辦法解釋，為甚麼在都市獨生女受到賦權的同時，中國城市的出生性別比也在愈走愈高。

那麼，在一個具有諸多面向的故事中，馮文何以會局限於「現代化的文化模式」，並且將其視野局限於獨生子女的教育(尤其是高考)領域呢？其實，在馮文的整個研究理路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她的研究方法及其帶來的偏差。儘管馮文以實用主義者的姿態同時使用了定性與定量研究方法，但是兩種方法的結合並沒有帶來堅實的數據資料與生動的訪談資料的有機結合這種理想效果。混合的研究取向不外是要在兩種方法立場之間揚長避短，然而馮文卻沒有能夠發揮量化研究在「代表性」以及「推論總體」上的優勢。

馮文以偶遇抽樣的方式抽取了三個調查樣本：一所職業高中、一

所初中和一所非重點高中，這使得整個研究樣本都局限在成績相當一般的大連獨生子女。成績較好的重點初中和重點高中學生，完全沒有出現在馮文的樣本中(顯然，就中國的實際情況來看，馮文不大可能光憑英語優勢就能在重點中學供職，其門檻要高很多)。這使得馮文對於獨生子女前景的判斷更為暗淡。馮文看到那麼多激烈競爭的學生卻只有相當小部分的人可以進入大學本科；卻沒有看到在重點中學中，儘管競爭同樣激烈，但是學生卻有相當大部分可以進入大學本科。

這種樣本偏差的缺陷在馮文對定性資料的抽樣中進一步加深。馮文是通過義務家教的方式進入獨生子女家庭的，可以想像，需要(義務)家教的家庭往往是對孩子的教育期望相對更高的，這使得馮文能深入進行訪談的家庭，往往是全家以孩子的教育為軸心的模式特別突出(甚至特別想送孩子出國)，這確實使得馮文更有可能得到「現代化的文化模式」及其相關印象。不妨想一下，即使單純地以馮文所有的學生作為樣本，她不以義務家教而以隨機家訪的形式來展開田野調查，假設她仍然只有時間和精力與其中的31個家庭建立長期聯繫，那麼這31個家庭所提供的獨生子女圖景也該是更為多彩的吧？

另一方面，馮文似乎忽視了不同的社會化階段對獨生子女帶來的影響，而在某些中國學者的研究中，這種影響甚至成為了影響獨生子女成長的最重要因素^②。馮文所關注的獨生子女完全處在學校社會化階段。由於學校相似的機構性質，學生確實形成了很大的同質

馮文似乎忽視了不同的社會化階段對獨生子女帶來的影響。她所看到的所有的家庭幾乎都圍繞着子女的教育轉，並表現出極大的同質性，如果她能夠兼顧到其他的社會化階段，如考察一下已經進入到工作崗位或者大學的獨生子女，或許看到的圖景也會發生改變。

計劃生育作為中國的一項重要的社會政策，既有自己的政策預期，也存在各種現實狀況，在政策下的群體已經成長起來後評估當時的預期和選擇，或許也是一項不可逃避的任務。

性；更不要說對於大多數馮文所關注的學生而言，還頭懸高考的「達摩克里斯之劍」。她所看到的所有的家庭幾乎都圍繞着子女的教育轉，並表現出極大的同質性，在這種情況下確實也並不奇怪。但是如果馮文能夠兼顧到其他的社會化階段（當然，馮文從學校出發的研究路徑已經堵死了這條路；不過客觀來說，隨着計劃生育政策成長起來的一代，在馮文進行田野調查時很多也確實處於中學階段），如考察一下已經進入到工作崗位或者已經進入大學的獨生子女，或許她看到的圖景也會發生改變吧？

除去這些令人多少有些氣餒的「水土不服」和缺陷，馮文的中國獨生子女研究視角獨特，觀點清晰，用很生動的語言講述了獨生子女及其家庭在中國的教育體制之下的實踐和努力。閱讀該書有助於我們理解獨生子女在「提高人口素質」上的作為和困境，有助於理解中國教育體制下的家庭期望和實踐。計劃生育作為中國的一項重要的社會政策，既有自己的政策預期，也存在各種現實狀況，在政策下的群體已經成長起來後評估當時的預期和選擇，或許也是一項不可逃避的任務。

註釋

①⑩ Vanessa L. Fong, "China's One-Child Polic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Urban Daughter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4, no. 4 (2002): 1098-1109. 中文譯文參見馮文：〈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與都市獨生女的賦權〉，《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6期，頁14-25。

② 這樣的社會主要指中國城市社會。由於中國的城鄉分割以及計劃生育政策在城鄉的不同執行，獨生子女家庭在城鄉的分布並不一致。

③ 當然「80後」的概念並不與獨生子女完全重合，但是「80後」確實是「中國獨生子女政策下的新時代」出生和長大的一代。

④ 國內的相關研究可參見風笑天：《獨生子女：他們的家庭、教育和未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獨生子女青少年的社會化過程及其結果〉，《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6期，頁118-31；《中國獨生子女：從「小皇帝」到新公民》（北京：知識出版社，2004）。

⑤⑫ 風笑天：〈獨生子女青少年的社會化過程及其結果〉，頁118-31。

⑥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2001年12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網站，www.chinapop.gov.cn/xxgk/zcfg/flfg/200403/t20040326_87200.html。

⑦ 在這本書出版之後，馮文仍然回大連繼續進行回訪。從其最新發表的文章來看，馮文於2004至2006年間回大連繼續進行了為期五個月的田野調查，參見Vanessa L. Fong,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Problems and the Perceived Inadequacies of Chinese Only Children", *Ethos* 35, no. 1 (2007): 85-127。

⑧ 風笑天：〈中國獨生子女研究：回顧與前瞻〉，《江海學刊》，2002年第5期，頁90-99。

⑨ 李銀河：《生育與村落文化：一爺之孫》（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3），頁214。

⑩ 楊發祥：〈當代中國計劃生育史研究〉（浙江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3），頁232。

王曉燾 南京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研究生